

πολιτικ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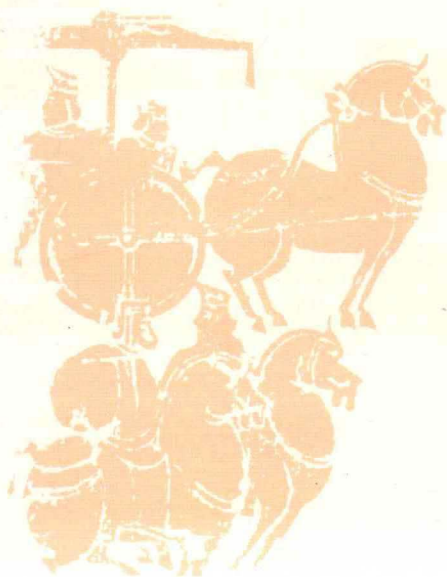
政治哲學文庫

甘阳 刘小枫 | 主编

刘玮 著

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政治现实主义与基督教



庫

刘 玮 著

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政治现实主义与基督教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 / 刘玮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617-9233-9

I. ①马… II. ①刘… III. ①马基雅维利, N. (1469~1527)—政治思想—研究 IV. ①D0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5046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

刘玮 著

责任编辑 万 骏

封面设计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z.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9233-9/B·687

定 价 24.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甘 阳 刘小枫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大学系科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设在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就其本性而言,政治哲学是一种超学科的学问。

在 20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位置,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同样激烈地展开,“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以政

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展。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科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友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其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要么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要么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无异于男性中心主义,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以上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桎梏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题极为广泛,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达。此外,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共同体出现重大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60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而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

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

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形成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独立视野和批判意识。坊间已经翻译过来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统,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重大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戒绝盲目跟风赶时髦,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为遵循施特劳斯派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深入分析和批判。同样,我们虽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却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拒斥现代。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

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明显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

“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古希腊到马基雅维里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罗马尤其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无不从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当然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盲从信徒，而应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尤其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精神，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深入探讨、疏理和发展。近百年来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标签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实乃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必须彻底扭转。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矫枉过正，即以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甚至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深入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应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

家和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倒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和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必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既要求不断返回问题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经典,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又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古老的文明中国如今已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疏理中国政治哲学传统,都有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置身于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明自觉,这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叩问。我们希望,这套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成熟。

2005年夏

致 谢

如果没有我的几位老师也就不会有这本小书的出版。

2003 年通过彭刚老师翻译的《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①邂逅施特劳斯(Leo Strauss)是我求学道路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从那开始,我对基督教的兴趣逐渐被对政治哲学的兴趣代替;机缘巧合,我也经历了一条与施特劳斯相似的道路,通过现代政治哲学走向了古典政治哲学,从马基雅维利走向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2003 年从北大来到清华读硕士,入清华之前我的计划是跟随王晓朝老师研究教父哲学,但是到清华报到之后却阴错阳差地放弃了之前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跟随田薇老师专心致志地读起了政治哲学。这时让我心醉的是“写作技艺”的大师马基雅维利,通过他我逐渐熟悉了施特劳斯推崇的“字里行间的阅读”,并完成了非常“施特劳斯化”的硕士论文《马基雅维利的基督教批判》,也就是收入本书的“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一文的底本。也正是在清华,我结识了《自然权利与历史》的译者彭刚老师,思

①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3 (我更倾向于将这部书的标题译为《自然正当与历史》)。

史、施特劳斯和马基雅维利一直是我們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自从第一次见面，他的为人与为学都为我树立了出色的典范，彭老师也成为了在我求学路上一直影响着我、鼓励着我的良师益友。

2006年我又从清华转投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申请时写的博士研究计划是沿着马基雅维利开创的道路继续研究现代政治哲学，但是不巧石元康老师刚好在那一年退休，于是我又转向了自己一直有兴趣但没有机会深入研究的古典政治哲学，开始跟随王庆节老师撰写有关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论文。不过有趣的是，作为整个博士论文出发点的那个问题却是由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引发的：

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个给人民颁布超凡法律的立法者不求助于神，因为除此之外，那些法律不会被人民接受，因为明智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很多好本身对理性来说并不那么明显，以至于他们不能说服他人接受。因此那些想要避免这一困难的智者就求助于神。（《李维史论》[Discourses] I. 11）

我的博士论文正是要解决亚里士多德如何在不求助于神的情况下，将那些好处赋予人们，从而解决公益（common good）与私利（private good）之间的矛盾。

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同时，我也一直对马基雅维利念念不忘：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我总是会格外留意一下有关马基雅维利的新书；在翻阅政治哲学和思想史的期刊时，我总是会特别关注有关马基雅维利最新论文和书评，每每看到，我也总是会习惯性地复印一份留在手边，即便当时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

意义。

2008年6月,从朋友那里得知韩潮老师正在主编的《思想研究》第八辑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专辑,我难掩兴奋之情,非冒昧地写信给他,自告奋勇地希望能够承担一些工作。而韩老师非常热情和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跟韩潮老师的不断交流,我的写作范围也逐渐扩大,2009年4月完成了收在这本小书中的两篇长文,《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和《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后来因为篇幅和出版这本小书关系,只在《思想史研究》中收录了后者。在此,我要感谢《思想史研究》允许我在这里重印经过少量修改的《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一文。

2009—10学年,我到伯克利访问并撰写博士论文。刚在伯利安顿下来,我的另一位老师和朋友白彤东便发邮件给我,告诉我他正在组织美国哲学会太平洋分会一个关于中西政治现实主义比较的专题讨论(而他的一个重要意图正是反思施特劳提出的马基雅维利开创现代性的命题),约我写一篇关于马基维利的论文,于是我就提交了关于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政治现实主义比较的论文摘要(一个我考虑了很久但一直没有笔的题目),并在2010年初完成了英文论文“Advising the Tyrant and Advising the Prince: Aristotle and Machiavelli on Political Manipulation”的初稿。在报告之前,伯克利法学院和政治学系的Kinch Hoekstra教授阅读了全文,并提出了中肯的改意见;我也要感谢参加该组讨论的学者,特别是我的论文评人Owen Flanagan教授对这篇论文提出的意见。会议之后,将这篇英文论文翻译和改写成了收录在本书中的第二篇:《为主出谋与为君主献策: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论政治现实主义》,并发表在《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4期上,这里要感谢

《政治思想史》允许我在这里重印经过少量修改的这篇文章。

我要将自己出版的这第一本小书献给我求学路上的所有老师,有一些是我在上面提到的,但更多是我无法一一提及的。他们不仅包括我读大学之后的老师,也包括我的父母和已故去的姥姥——他们是我最初的老师,还有我中学的所有老师,尤其是两位对我有着特别影响和意义的班主任——朱均和李英芬,我如今选择以学术为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他们的言传身教。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韩潮和刘小枫两位老师给我机会出版这本小书;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编号10XNF093)提供的资助。

目 录

致谢 / 1

导言 / 1

第一章 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研究:思想历程、主要论题与学界反响 / 5

一、施特劳斯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历程 / 5

二、施特劳斯马基雅维利研究中的主要论题 / 20

三、学界对施特劳斯马基雅维利研究的反响 / 45

第二章 为僭主出谋与为君主献策:亚里士多德与马基雅维利论政治现实主义 / 72

一、马基雅维利的宣言 / 72

二、为僭主出谋:亚里士多德教导僭主如何保全统治 / 75

三、为君主献策:马基雅维利与亚里士多德的相似之处 / 81

四、挑战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性” / 89

五、亚里士多德 vs. 马基雅维利:古代 vs. “现代” / 94

2 马基雅维利与现代性

六、结论 / 102

第三章 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重申施特劳斯的论题 / 105

一、历史悠久的争论 / 105

二、基督徒马基雅维利 / 107

三、马基雅维利的两套教导 / 111

四、《布道》为何不能证明马基雅维利的基督教信仰 / 114

五、表面文章 / 117

六、背后攻击 / 122

七、马基雅维利的渎神:上帝是一个软弱的君主 / 132

参考文献 / 156

导 言

正如我在“致谢”中提到的，施特劳斯将我引入政治哲学史的殿堂，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了对政治哲学史的探索，并从中挑选了马基雅维利和亚里士多德作为我过去七年的研究对象。

施特劳斯是我研究政治哲学的引路人，而马基雅维利是我真正“研究”的第一个政治哲学家，因此这本小书以“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开始再合适不过。在这篇带有很强综述性质的文章中，我试图通过施特劳斯本人的文字梳理出他研究马基雅维利的一条路径，同时考察他的解读在马基雅维利研究界带来的持久影响。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他的研究无疑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成为未来学者进入马基雅维利思想世界途中必须要奋力攀登的一座险峻的高峰。在攀上这座险峰之后，我们眼前必将呈现一片别样的风景，但我们同时也会清楚地看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道路依然在面前延伸。

这句话最好地表达了我对施特劳斯的感情，他对马基雅维

利的解释确实为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呈现了一幅别样的风景。他的解读大大深化了马基雅维利的文字所传达的信息,同时也让阅读马基雅维利变得更有趣味。我将施特劳斯看作我在政治哲学史领域的精神导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像他的某些弟子那样对他的一字一句皆马首是瞻,因为那句来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6 的拉丁格言 *amicus Plato, magis amica veritas* [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始终对我有着更大的影响:学生尊重和感谢老师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对老师亦步亦趋,而是努力让自己在老师的领域变得卓越,即便无法在整体上超越老师,至少也要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向前多走一步。在反复阅读马基雅维利和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解读之后,我的体会并非如曼斯菲尔德充满深情地表达的——施特劳斯无处不在;相反,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施特劳斯主义者”应该像施特劳斯本人那样在经典文本中不断挖掘出新的思想资源,挑战权威的解釋(这些“权威”自然也包括施特劳斯本人),这样才是对“回归经典”的最好诠释。因此在我看来,施特劳斯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带给我们的最大贡献恰恰是它开启了解读马基雅维利的新方式和新道路,这条道路并没有、也不可能在施特劳斯那里终结,而是会一直在我们面前延伸。我始终相信,作为一个真正的“施特劳斯主义者”,最重要的乃是牢记施特劳斯的如下教诲:

哲学之为哲学就是对问题的真正意识,绝非其他;也就是对那些根本性的和综合性的问题的真正意识。思考这些问题不可能不被解答吸引,这样思考者就被引向极少的几个典型解答。但是只要没有获得智慧本身,而只有对智慧的追寻,那么我们对所有这些解答的证据就必然小于那些问题的证据。如果一个哲学家对

某个解答真理性的“主观确定”超过了他对这个解答所具有的可疑性的意识,那么从这一刻起,他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了。从这一刻起,宗派也就产生了。^①

施特劳斯以其精深的文本解读功力向我们展现了这些永恒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就他是一个自己笔下的“哲学家”的意义上,施特劳斯并没有、恐怕也不会奢望给出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

随后的两篇论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种“延伸”的产物。我在第一篇综述中指出的,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解释的核心命题是马基雅维利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性。而他用以支持这一核心命题的两个关键论证是:(1)马基雅维利颠覆了支配古典政治哲学的古典德性理论;(2)马基雅维利颠覆了基督教的统治地位。接下来的两篇论文分别就这两个方面更深入地作了讨论。

在第二章“为僭主出谋与为君主献策”中,我比较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现实主义(在《政治学》V. 10—11 讨论如何维持僭主统治的部分里达到顶峰)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 16—23 章中所传达的政治现实主义。之所以讨论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施特劳斯更喜欢的色诺芬(Xenophon)和柏拉图(Plato),恰恰是因为亚里士多德代表了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一个有些不同的分支,他对政治高度经验化的讨论在很多方面与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教导的“有效真理”如出一辙。因此在政治现实主义的意义(也就是在颠覆传统道德观念的意义上),我们似乎没有

① Leo Strauss, *On Tyrann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eds. Victor Gourevitch and Michael S. Roth, New York: Free Press, 2000, p. 191. 我相信当施特劳斯的得意门生罗森(Stanley Rosen)将他的 *Plato's Republ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献给“真正的利奥·施特劳斯”(genuine Leo Strauss)时,他想要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